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城乡不均衡 的最新演变

——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分析

吴 炜

[摘要] 文章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考察了我国城乡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新变化。数据结果显示:第一,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城乡不均衡仍然存在;第二,与“80后”相比,“90后”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差异显著下降;第三,城乡不平等程度下降更多表现在量的层面,在质的层面,相对于专科教育,本科教育中的城乡不平等程度没有明显变化。基于已有研究结果,文章完整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城乡不平等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演变全貌,对理解70年来高等教育中的城乡不均衡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新时代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教育公平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

[关键词] 高等教育;“90后”;机会分配;城乡不均衡

教育获得(特别是高等教育获得)作为影响个体社会流动的最重要机制,同时也作为一个表示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1],一直以来都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基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户籍身份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很自然地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之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变化趋势做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产出了非常多的成果。

基于20世纪后半叶的实证资料,有学者指出,1949年以来,在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我国城乡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经历了大的、方向性的转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1970年代,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逐步降低,而1980年代之后,农业和非农业户籍身份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影响又逐渐增强。^[2]而1999年推出的高等教育大扩张政策,则引起了一个更大的研究高潮。政策推出之初,人们大多持乐观的预期,认为高等教育扩张将为城乡居民接受高等教育带来更多的机会,城乡出身等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下降,高等教育将逐渐平等化。^[3]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的感知似乎日趋严重,一再引起国内舆论的关注。学界的研究也得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与之前相比,高校扩招后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城乡之间的差距上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4]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为理解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机会不平等结构、影响因素及其演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实证材料。然而,仔细分析已有研究成果所依据的实证资料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城乡不平等程度增强这一结论几乎都是通过分析2008年及之前的数据得出的,研究的群体主要是“80后”及之前的出生世代,反映的是那些世代在10多年前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情况,缺乏对近10年在大学接受教育的“90后”世代中的高等教育城乡不平等状况的研究。那么,“90后”世代中的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仍然在扩大么?抑或有所缩小?换句话说,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城乡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到底如何呢?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

[收稿日期] 2019-06-19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教育获得中的同胞支持效应研究”(编号:19YJC840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获得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南京理工大学)的支持。

[作者简介] 吴 炜,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邮编:210094。

一、文献综述

教育扩张和教育不平等的关系众说纷纭,在一系列的关系讨论中,形成了以下几个代表性理论解释。(1)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拉夫特瑞(Rafertry)和豪(Hout)指出,高等教育机会分配并不会伴随着教育扩张而自然平等化,因为新增加的教育机会大多被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较高阶层所抓住,进而,教育不平等会最大限度的得到维持,这被称为最大化维持不平等理论(简称MMI理论)。^[5]该理论进一步指出,无论在教育的哪个阶段,社会中的上层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第一个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基本满足,如80%或更多时,教育扩张所增加的机会才会外溢至社会中下阶层。(2)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卢卡斯(Lucas)注意到在高等教育阶段,不同学校教育机会的含金量是不一致的。进而他对MMI理论做了修正,提出了有效维持不平等理论(简称EMI理论)。卢卡斯认为高等教育不平等表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数量上的,另一个是质量上的。在高等教育扩张的进程中,即便数量上的不平等下降,教育不平等仍然会得到有效的维持,即质量上的不平等仍会存在,因为较高阶层将竞争转移到了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机会中。^[6]卢卡斯使用美国的调查数据证明了这一理论假设,后续的基于其他国家的研究也支持了其观点。^[7]这表明随着高等教育规模扩张,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很可能会以一种更加质性的方式替代以前的量化方式。(3)教育不平等阶段差异论。这一理论的立足点在于认为教育扩展后教育不平等并不能由“持续/非持续、增强/减弱”这样的表述完全捕捉^[8],海尔塞(Halsey)、瑞吉(Ridge)研究了英国的实证材料后认为,教育扩张的初期很可能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上升,在教育扩展的后期才有可能逐步下降,即教育扩张与教育不平等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9],他们把由这种关系形成的曲线称为“教育库兹涅茨曲线”。新的研究也一再证实随着高等教育扩张,教育不平等的程度先是提高,在达到一定值以后会逐步降低。^[10]

就国内研究而言,随着我国的高等教育大扩张,学者们借鉴MMI理论和EMI理论,基于我国国情,从对教育扩张以来高等教育机会城乡分配的差异及其变迁展开了探讨。学界一致认为,城乡不平等是我国教育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和特征,与农村或农业户口家庭子弟相比,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城市或非农业户口家庭子女在获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处于明显优势。^[11]李春玲利用2005年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教育扩张并没有降低阶层以及人口学特征方面的不平等,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12]杨炯等也利用该数据,通过户内人口匹配方法和加权弥补人口抽样调查的“选择性偏差”后得出的模型表明,高校扩招以来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效应与李春玲的观点相左,但城乡差距的扩大化方面却仍保持一致。^[13]李春玲几年后的另外一项研究结果也表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的优势在1999年之后不仅得以维持而且在某些层面有所加剧。^[14]吴晓刚的一项研究也得到了是一致的结论,与出身于城镇的个体相比,出身于农村的个体在教育机会获得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位置。^[15]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在我国长期存在,并且在1999年教育扩张后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6]

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扩大不仅表现在量的层面,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逐步迈向较为隐性的“质的不平等”方向,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有研究发现,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新增的农村大学生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普通院校。^[17]有研究利用学生高考成绩的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发现,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相对于城市家庭的学生,农村家庭学生进入“211工程”高校的机会呈下降的趋势。^[18]吴愈晓则发现,虽然高中升大学阶段户籍身份变量在个体进入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或大专与本科的路径分化中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由于小学和中学阶段获得重点学校机会的累积性优势效应,与农民子弟相比,城市子弟仍然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机会上处于优势。^[19]

此外,在教育不平等演变的机制分析中,国内学者们注意到了一点:很多研究大多忽视了社会制

度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变化对教育不平等传递的影响。他们认为应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将国家政策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好把握我国教育不等的历史演变。^[20]这就意味着 MMI 理论和 EMI 理论所描绘的现象虽然存在,但它并非是我国市场转型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它必须受制于国家政策。只有当国家政策呈现出某种较强的市场化倾向时,城乡之间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扩大的现象才会出现。^[21]而一旦国家对城乡教育机会分配进行干预,就很可能削弱这种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毋庸置疑,近 10 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根据最新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2018 年我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 833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8.1%,已经迈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后期^①。就高中升大学这一阶段而言,据有关数据显示,2017 年浙江等部分省份的大学录取率已经超过了 90%,其它较低的省份也在 80% 左右。也就是说,与“80 后”世代相比,“90 后”世代进入大学的机会已经要高的多。此时,较高阶层的高等教育机会已经基本满足,依据 MMI 理论,此时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状态极有可能发生变化。

更重要的是,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与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初衷完全相悖,教育公平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指导思想,教育公平一再被强调为我国的基本教育政策,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在教育理念上,20 世纪 90 年代后,教育作为一个产业进行发展的思路在我国浮现,此后若干年一直指导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产业化注重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致力于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率,对于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水平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一理念逐渐被演变成教育市场化、教育商业化。加上不少地方政府以此为理论武器甩包袱,减少教育投入,导致教育不平等的恶化。21 世纪以来,教育产业化的政策理念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并最终于 2004 年被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否定,此后,教育产业化思潮在教育政策中的影响逐渐消退。在实践中,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增加教育投入,并于 2012 年达到了 GDP 的 4% 的目标;加强了城乡教育机会分配的干预,如较长时间内稳定学费的增长,完善并提高大学生的奖助学金和资助体系,实施了国家专项、地方专项高校专项等等,这些有利于农村子弟入学的教育政策,必将促进高等教育公平。

如前文所述,已有研究对 1999 年教育扩招之后城乡差距扩大这一结论形成了几乎一致的意见。但是,这种扩大趋势是否仍然维持? 或者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 因此,有必要将 2008 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不平等状况纳入研究视野之内,以进一步厘清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变化趋势。

二、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研究采用的是 2015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该数据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分城乡从全国范围内选择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访问收集而得。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个体信息、家庭资料、工作情况等,当年共完成了 10 968 个个体样本。根据本研究的需要,我们将 1980 年及之后出生的个体抽取出来,共计 2 411 人。

(二) 变量

本文的目的在于考察教育扩张以来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不平等是否发生了变化。因变量包括两个:一是个体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包括在读),二是个体所接受大学教育的层次,即是本科还是专科。核心自变量也包括两个:一是出生世代(时期)。根据研究需要,将 1999 年教育扩张以来分

① 教育部. 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2019-07-24/2019-08-01. 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fztigh/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

为两个阶段,初期和后期,由于“80 后”应该是在 2008 年及之前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90 后”应该是在 2008 年之后开始接受高等教育,我们将初期和后期的分界点定于 2008 年。二是户籍身份,取被访者 14 岁时的户籍身份,将农业户口赋值为 0,非农户口赋值为 1。基于以上两个自变量,我们可以通过出生世代全面分析教育扩张初期和教育扩张后期城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演变趋势。

控制变量包括:父亲职业地位指数,将研究对象 14 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转化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进行测量。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选择被访者父母中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将按惯例将其转化为受教育年限。民族,汉族赋值为 1,少数民族赋值为 0。性别,女性赋值为 0,男性赋值为 1。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 1。

(三)方法

本研究采用加入出生世代交互变量的梅尔升学模型进行分析。^[22]该升学模型以是否上大学为因变量,把出生世代作为控制变量,并通过出生世代与模型中自变量的交互效应来考查高等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

表 1 变量的描述

	合计	世代	
		80 后	90 后
接受过大学教育(%)	49.5	36.5	46.7
民族(汉族%)	91.7	91.6	91.9
性别(男性%)	47.4	45.7	50.0
户口(非农户口%)	33.5	31.3	36.8
父亲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28.2	27.3	29.7
父母受教育年限	8.6	8.2	9.3
样本量	241	1 470	941

三、分析结果

(一)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总体状况

根据研究设计,使用“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作为因变量、家庭背景因素作为自变量并加入交互项的嵌套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见表 2)。首先建立以性别、民族、父母受教育年限、父亲职业地位指数、户口、世代作为自变量的模型 1。从模型中可见,性别和民族对否接受大学教育的影响不显著。父亲职业地位指数、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受访者 14 岁时户口身份、是否“90 后”世代对个体能否接受高等教育影响显著。具体而言,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显著为正,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增加 20.3% ($\exp^{0.186} - 1 \approx 0.203$, $p < 0.001$);父亲职业地位有利于子女获得高等教育,父亲职业地位指数每增加 1 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就增加 1.6% ($\exp^{0.016} - 1 \approx 0.016$, $p < 0.001$);14 岁时受访者的户籍身份对是否接受大学教育具有显著影响,具有非农户籍身份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几率比农业户籍身份的个体高 1.84 倍 ($\exp^{1.044} - 1 \approx 1.84$, $p < 0.001$);在高校持续扩张的时期,世代对是否接受大学教育具有显著影响,与“80 后”相比,“90 后”进入大学的几率要高 51.7% ($\exp^{0.417} - 1 \approx 0.517$, $p < 0.001$)。

(二)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时期比较

根据升学模型,我们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世代变量和 14 岁时户籍身份的交互项建立模型 2,该模型交互项的效应可以反映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城乡不平等的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为更全面的了解阶层不平等的变迁,我们也在这个模型以及后续模型中同时加入了世代变量和父亲职业地位指数的交互项。从该模型中可以看出,性别和民族变量的影响仍然是不显著的。父亲职业地位指数、父母受教育年限、受访者 14 岁时户口身份、是否“90 后”世代等变量仍然显著影响了

个体是否接受大学教育。

“90 后 × 父亲职业地位”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且是负数,说明与“80 后”相比,父亲职业地位指数对“90 后”获得大学教育的效应显著降低了。具体而言,父亲职业地位每上升 1 点,“80 后”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增加 2.4% ($\exp^{0.023} - 1 \approx 0.024, p < 0.001$),“90 后”获得高等教育的几率则增加 0.3% ($\exp^{0.023-0.020} - 1 \approx 0.003, p < 0.01$)。“90 后”× 14 岁时户口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与“80 后”相比,户籍身份对“90 后”高等教育获得的效应下降了,具体来看,“80 后”中非农户籍身份子女进入大学的几率比农业户籍身份的子女高 2.64 倍 ($\exp^{1.291} - 1 \approx 2.64$),而在“90 后”中,这一数字降低至 1.16 倍 ($\exp^{1.291-0.522} - 1 \approx 1.16, p < 0.001$)。

综上所述,自 1999 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父亲职业地位和户籍身份两个变量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影响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随着国家调整教育政策,加强对教育公平问题的干预,与“80 后”相比,“90 后”的高等教育公平环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已经有所缩小。

表 2 估计高等教育获得的 Logit 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
性别(男性=1)	-0.162 (0.107)	-0.151 (0.107)
民族(汉族=1)	0.375 (0.200)	0.365 (0.199)
父母受教育年限	0.186*** (0.019)	0.187*** (0.019)
父亲职业地位指数	0.016*** (0.004)	0.023*** (0.005)
14 岁时户口(非农=1)	1.044*** (0.122)	1.291*** (0.160)
世代(“90 后”=1)	0.417*** (0.108)	1.144*** (0.225)
世代 × 父亲职业地位指数		-0.020** (0.007)
世代 × 14 岁时户口		-0.522* (0.246)
常数项	-3.348*** (0.257)	-3.661*** (0.274)
样本量	1 983	1 983
pseudo R ²	0.193	0.200

注:(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2) 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三) 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变化趋势

由于不同等级高校的文凭价值差异较大,个体的教育获得就不仅体现在是否获得了高等教育,还体现在获得了何种层次的(专科或本科、重点大学或非重点大学)教育。由于数据中缺乏个体接受教育的大学是否为重点大学这一信息,我们只能较为粗略地将因变量分为三类: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接受专科教育、接受本科教育,建立了一个无序多分类的 logit 模型进行分析,将性别、民族、父母受教育年限、父亲职业地位指数、户口、世代变量以及 14 岁时户口、父亲职业地位指数两个变量与同期群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详见表 3。

从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可知,父亲职业地位指数在模型中的主效应显著为正,表明说明在“80 后”世代中,与未接受大学教育相比,父亲职业地位会显著影响个体接受大学专科和本科教育的机会。具体而言,父亲职业地位指数每上升 1 点,“80 后”接受专科教育(相对于未大学教育而言)的

表 3 估计不同类型高等教育获得的 mlogit 回归模型

	模型(3) 专科 VS. 未上大学	模型(4) 本科 VS. 未上大学	模型(5) 本科 VS. 专科
性别(男性 = 1)	-0.052 (0.137)	-0.227 ⁺ (0.126)	-0.175 (0.153)
民族(汉族 = 1)	0.762 [*] (0.307)	0.133 (0.228)	-0.629 ⁺ (0.337)
父母受教育年限	0.131 ^{***} (0.024)	0.237 ^{***} (0.024)	0.107 ^{***} (0.029)
父亲职业地位指数	0.018 ^{**} (0.006)	0.027 ^{***} (0.005)	0.008 (0.006)
14 岁时户口(非农 = 1)	1.235 ^{***} (0.202)	1.347 ^{***} (0.187)	0.112 (0.221)
世代("90 后" = 1)	1.001 ^{***} (0.290)	1.322 ^{***} (0.269)	0.321 (0.327)
世代 × 父亲职业地位指数	-0.019 [*] (0.009)	-0.022 ^{**} (0.008)	-0.003 (0.009)
世代 × 14 岁时户口	-0.618 ⁺ (0.319)	-0.514 ⁺ (0.282)	0.103 (0.338)
常数项	-4.193 ^{***} (0.380)	-4.624 ^{***} (0.333)	-0.430 (0.439)
样本量	1 983	1 983	1 983
pseudo R ²	0.157	0.157	0.157

注:(1)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双尾检验)。(2) 括号里的数字为标准误。

几率约增加 1.8% ($\exp^{0.018} - 1 \approx 0.018, p < 0.01$), 接受本科教育(相对于未大学教育而言)的几率约增加 2.7% ($\exp^{0.027} - 1 \approx 0.027, p < 0.001$); 从模型 5 可知, 父亲职业地位指数、户籍身份变量在模型中的主效应都不显著, 说明相对专科教育而言, 父亲职业地位的提高和市民身份不会增加其接受本科教育的机会。父亲职业地位与世代的交互项在模型 3 和 4 中显著为负, 说明与“80 后”相比, 在无论是专科还是本科(相对于未接受大学教育而言)中, 父亲职业地位的影响在“90 后”中下降了; 此外, 在模型 5 中交互项不显著, 表明与“80 后”世代相比, “90 后”世代中本科教育(相对于专科教育)机会分配的阶层不平等没有变化。

就本文的核心关注点而言, 从模型 3 和模型 4 中可知, 户籍身份变量在模型中的主效应显著为正, 说明在“80 后”世代中, 与未接受大学教育相比, 14 岁时个体户籍身份会显著影响个体接受大学专科和本科教育的机会。“80 后”中非农户籍身份的个体接受专科教育(相对于未大学教育而言)的几率比农业户籍身份的个体高 2.44 倍 ($\exp^{1.235} - 1 \approx 2.44, p < 0.001$); 非农户籍身份的个体接受本科教育(相对于未大学教育而言)的几率比农业户籍身份的个体高 2.85 倍 ($\exp^{1.347} - 1 \approx 2.85, p < 0.001$)。户籍身份与世代的交互项在模型 3 和 4 中在 0.1 的水平上边缘显著为负, 说明与“80 后”相比, 在无论在专科教育还是本科教育(相对于未接受大学教育而言)中, 户籍制度的影响在“90 后”中都下降了。“90 后”中非农户籍身份的个体接受专科教育(相对于未大学教育而言)的几率比农业户籍身份的个体高 0.853 倍 ($\exp^{1.235-0.618} - 1 \approx 0.853, p < 0.1$), 而在“80 后”为 2.44 倍; 非农户籍身份的个体接受本科教育(相对于未大学教育而言)的几率比农业户籍身份的个体高 1.30 倍 ($\exp^{1.347-0.514} - 1 \approx 1.30, p < 0.1$), 而在“80 后”为 2.85 倍。此外, 模型 5 表明, 交互项不显

著,即户籍身份的效应在两个世代中没有发生变化,即接受优质本科教育(相对专科教育而言)的城乡不平等没有下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的数据,通过比较“90后”和“80后”两个世代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中的状况,呈现了近年来我国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最新演变趋势。研究表明:一是,近二十年,户籍制度始终显著影响个体的高等教育获得,城乡之间高等教育机会的差异在“80后”和“90后”两个世代中都存在;二是,与“80后”世代相比,“90后”世代中城市子弟和农村子弟之间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我们认为,世纪之交正值高等教育扩张之初,教育机会仍很稀缺,此时也正是市场化话语最强烈的时期,国家政策干预的力度较低,而随着高等教育扩张的持续推进,教育机会持续增长,教育公平问题也得到了党和政府极大的关注,政策干预力度空前增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平等程度得以降低,因此,与教育扩张前期入学的“80后”世代相比,“90后”世代就读大学的时期(即2008年之后)拥有一个相对更加宽松和公平的教育环境;三是,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不平等下降主要体现在量的层面,就优质的本科教育机会获得而言(与专科教育机会获得相比),城乡不平等程度并没有实质性的下降,这也是未来政府需要予以关注的。

基于本研究所展现的2008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城乡不平等状况,并纳入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完整的展现194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城乡不平等的演变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政治、社会、经济等制度性变迁,高等教育中的城乡不平等迅速下降,在改革开放后不断上升,呈现一种U型曲线关系。而且这种上升趋势在1999年教育扩招之后一段时期内得以维持,进入了2008年之后,上升态势得到遏制,不平等程度趋于下降,又呈现倒U型曲线图景。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城乡不平等程度的下降还只表现在量而非质的层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报告同时认为,要达成这一伟大目标,推进教育公平是必由之路。本研究表明,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城乡不平等程度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扭转,正在向更加公平的阶段迈进,这充分说明了国家政策干预的积极效果。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户籍制度具有巨大的刚性,它将地理空间上的位置被转换成了一种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的结构性差异,进而产生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在教育机会的量和质上的不平等。在新时代,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政策干预力度,降低高等教育体系内的城乡不平等,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获得中的不平等。要采取措施,加大对优质教育资源分配的干预,采取照顾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制度设计,完善专项招生政策,为农村子弟提供更多高等教育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促进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 [1] 侯利明. 地位下降回避还是学历下降回避——教育不平等生成机制再探讨(1978—2006). 社会学研究, 2015(2): 192-213
- [2] 李春玲.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 中国社会科学, 2003(3): 86-98
- [3] Boudon 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Wiley, 1974
- [4] 李春玲. “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 2014(4): 66-77
- [5] Raftery A E, Hout M.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xpansion, Reform and Opportunity in Irish Education 1921—1975.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3(1): 41-62
- [6] Lucas S R. 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Education Transitions, Track Mobility, and Social Background Effec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1(6): 1642-1690

- [7] Ayalon H, Shavit Y. Educational Reforms and Inequalities in Israel: The MMHypothesisRevisit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04(2):103-120
- [8] 刘精明. 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机会不平等及其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 2008(5):119-122
- [9] Tyler W, Halsey A H, Heath A F, et al. Origins and Destinations: Family, Class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Britai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1981(6):71-75
- [10] Meschi E, Scervini F. Expansion of schooling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Europe: the educational Kuznets curve revisited. *Gini Discussion Papers*, 2012(3):660-680
- [11] 杜桂英. 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10):78-84
- [12] 李春玲.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的考查. *社会学研究*, 2010(3):82-113
- [13] 杨舸, 王广州. 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兼与《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平等》一文商榷. *社会学研究*, 2011(3):33-53
- [14] 李春玲.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 *社会学研究*, 2014(2):65-89
- [15] 吴晓刚.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 *社会*, 2009(5):88-113
- [16] 吴愈晓. 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 *中国社会学*, 2013(3):4-21
- [17] 马宇航, 杨东平. 城乡学生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演变轨迹与路径分析.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5(2):7-13
- [18] Li H, Prashant L, Scott R, et al. Unequal Access to College in China: How Far Have Poor, Rural Students Been Left Behind?. *The China Quarterly*, 2015(1):1-23
- [19] 吴愈晓.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 *社会学研究*, 2013(4):179-202
- [20] 李煜. 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城市子女的教育获得(1966—2003). *中国社会科学*, 2006(4):97-109
- [21] 唐俊超.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 *社会学研究*, 2015(3):123-145
- [22] Mare R D.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1(1):72-87

The Latest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GSS2015 Data

WU Wei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in 2015,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new changes in the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opportun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the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opportunities still exists; Second, compared with the “post-80s” generation.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in the “post-90s”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ird, The decrease of urban-rural education inequality is more manifested in the level of quantity. On the qualitative level,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degree of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relative to specialist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after the 70 year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which first declined, then rose and then fell.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and also provides an empirical basis for putting forward more targeted educational equity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Post-90s”; Distribution of opportunities; urban-rural inequality